



诺贝尔文学奖
皇冠出版社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

[瑞典] 塞尔玛·拉格洛夫 著

王晔 译



Selma Lagerlöf

Gösta Berlings saga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

[瑞典] 塞尔玛·拉格洛夫 著

王晔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著;王晔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

书名原文:Gösta Berlings saga

ISBN 978-7-309-13367-7

I. 尤… II. ①塞…②王… III. 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041号

Gösta Berlings saga

by Selma Lagerlöf

本书初版于1891年,译本根据瑞典SVS(Svenska Vitterhetssamfundet)2013年版译出

本书获瑞典文化部艺术委员会翻译资助,特此鸣谢

Thanks to the support from Swedish Arts Council for sponsor of the translation costs.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 著 王晔 译

责任编辑/方尚岑

封面设计/周伟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125 字数336千

201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367-7/I·1084

定价:5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Selma Lagerlöf

Gösta Berlings saga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 编委会

名誉主编

石琴娥

编 委

万 之 王梦达 王 晔

导言

王晔

缘起——一群迷途的蜂

从前有一则萨迦，经过许多人的卓越创造，只差一个流畅的书写便好传遍大地。那是一群故事，一群未成形的历险之云，像一群迷途的蜂，不知在哪里能找到把它们收进蜂巢的人，最后，它来到了一座叫莫尔巴卡的庄园。一个孩子长在那里，听到了故事，渐渐充满书写的渴望。在《关于一则萨迦的萨迦》中，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858—1940）这样谈到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的创作缘起。

塞尔玛·拉格洛夫，19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出生在瑞典中西部的韦姆兰省，那座叫莫尔巴卡的庄园，这地方在她的处女作中成了利里亚克罗纳的秀美家园。

拉格洛夫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亲埃瑞克·拉格洛夫中尉于1852年继承庄园，母亲露伊斯来自富商家庭，日子原本宽裕。1860年代初，作为当地经济基础的农业和铁业受到严重冲击，拉格洛夫家的日子也艰难起来。

从小，拉格洛夫就爱听祖母讲故事，包括英、法文在内的早期

教育来自家庭教师。她三岁时罹患腿疾而跛脚，这对身心是不小的苦痛，唯一的好处是让她有机会离开闭塞乡间，外出治疗，看到更大的世界。她甚至认为，残疾使自己不至走上姊妹们走的不幸婚姻路。她从未把婚姻这类当时女性的要务看得多重。1881年，她更违抗父亲的意愿，到首都斯德哥尔摩接受师范课程的教育。不久，她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当上了教师。

拉格洛夫所谓故事经多人加工、几近完成，不同于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前有《莺莺传》，是说完整的民间传说或一星半点的闲谈在她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迹。有一种精神盘亘在韦姆兰大地，期待被表达。它来自先辈，是过去；连接着“我们”，是现在；甚至可以关联到后世的孩子们，是将来。然而，认识那熟悉的故土之魅力有时需要距离，而城市的拥挤人群未必不能给人认识遥远故乡那壮丽山河的契机。

1881年的一个秋日，拉格洛夫夹着几本书，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上。她刚听完一场文学史讲座，其中谈到贝尔曼和鲁内贝里。她琢磨着这两位作家及其诗歌中的人物，一个声音出现了：“我自己生活过的韦姆兰并不亚于他俩所描写的对象啊——只要我能学会处理。”这时，她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那条路似乎朝着天空扬起又落下，扬起又落下。她不得不停下脚步，站了好一会，路才归于稳定。道路扬起又落下的体验或为真实或为文学渲染，却十分接近她后来的处女作的楔子里，牧师尤斯塔·贝林站在布道台上获得的、教堂穹顶上升而地面下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灵感降临的体验吧。

文学讲座里提到的贝尔曼（Carl Michael Bellman, 1740—1795）是瑞典民族诗人，鲁内贝里（Johan Ludvig Runeberg, 1804—1877）则是芬兰民族诗人和瑞典语诗人，史诗《斯托少尉的传奇》（*Fänrik Ståls sägner*）的作者。史诗受十九世纪初正在发展的民族浪漫主义

影响，以 1808 年至 1809 年里瑞典与俄罗斯之间发生的芬兰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一群军人为祖国奋战的英勇故事。经过那场战争，瑞典失去了东部大片领土，史诗的基调中有难以掩饰的瑞典战败的苦涩。这也是拉格洛夫的父亲十分喜欢的一部作品。

从街头突遇灵感，到小说真正写出，还要耽搁好些年。因为未来的作家不久便当上了教师，工作忙碌；但或许更因为在她的内心，体裁还未定型。她先尝试史诗体；转而借鉴戏剧形式，圣诞夜一章曾是剧本的第一幕；最后，她用平和而现实的散文风来写小说。1885 年，拉格洛夫的父亲去世。五年后，庄园难以为继，不得不出售。拉格洛夫回家看那老宅最后一眼、深受触动——不能再等了！她心中忐忑，认为自己不可能写出什么杰作，而只是一部书，一部多半会让人笑话的书，但还是要写，“以便拯救她还能从家中拯救出的：那些亲爱的古老故事，那些无忧的日子和欢乐的平和，以及那美丽的风光——它有着修长的湖泊和变幻出不同蓝色的山峦”。

拉格洛夫大约需要从诗歌模式中解放，以便找到能承载她的故事和想象，适应她的文学时空的形式。她也需要一个更大刺激，如今，父亲的离世和家园的丧失重重地推了她一把。她以前所未有的快速度，写成一章又一章。不是用韵文而是用散文来书写，却仍可看到鲁内贝里的史诗的启发。从少尉到上校的军衔就附着在埃克比的侠士身上；民族浪漫主义及丧失故土的悲戚感，正契合丢失了故园并缅怀逝去之往昔的作家之心。史诗的气象在，韵文的余音也在。小说糅合了诗歌、散文诗、散文、戏剧和小说等多种笔法，不是预设和刻意的，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因为水到渠成，所以自然流畅、自成一体，也无从复制，甚至作家本人也不能够。

1890 年春，恰逢妇女周报《伊顿》（*Idun*）举办小说有奖征文，拉格洛夫在写好的内容中并不自信地挑出五章应征，意外获奖。继

而，《伊顿》编辑邀她出版全书。在友人的赞助下，她暂停教师工作，全心把故事写完。1891年，拉格洛夫借长篇小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登上文坛。

萨迦——上帝的风暴

这部小说描绘了1820年代，韦姆兰芦汶长湖（现实中叫Fryken）两岸的人物和事件。楔子两章，正文三十六章，都是可相对独立的小故事，也和其他章节有某种联系。出场人物繁多，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有三位，被革职的英俊牧师尤斯塔·贝林，有权势的少校夫人以及据说和魔鬼做交易的厂主辛特拉姆。拉格洛夫曾指出，故事历时一年，春天是冰雪消融的季节，夏天充满小田园诗，秋天是大革命，圣诞是一切的重建。确实，故事编织了从前一年圣诞夜到第二年圣诞夜、这季节变幻的整整一年，上帝风暴席卷芦汶长湖的一年。

年轻的牧师尤斯塔·贝林不堪生活和工作的沉重而酗酒，因酗酒被革职。躺在雪地里自杀的他，被有权势的埃克比的少校夫人救下，成了夫人供养的侠士中的一员。圣诞夜，十二名侠士从魔鬼口中得知，少校夫人每年向魔鬼提供一名侠士的灵魂，魔鬼则保证她对埃克比庄园和七座铁厂的控制权。魔鬼由邪恶的厂主辛特拉姆装扮，可那辛特拉姆认为自己和魔鬼没多少本质差别。侠士们一面对“魔鬼”的话将信将疑，一面对恩人少校夫人有了强烈愤怒，终于和“魔鬼”签约，侠士将管理埃克比和铁厂一年，行动得像个侠士，不然，他们的灵魂在一年后会被魔鬼一并取走。次日是少校夫人摆开的圣诞宴。侠士克里斯蒂安上尉将终于端上桌的松鸡误认作乌鸦，激愤地把“乌鸦”扔上墙，当众说起夫人与私通的旧事——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不过从未在大庭广众下被说破。少校夫人被少校逐出家门，成了路上的乞丐。少校搬回自己原来的庄

园，把埃克比和七个铁厂扔给侠士代理。魔鬼协议似乎真生效了。

少校夫人临走时断言，一场上帝的风暴就要席卷所有的人和整个的大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片大地上贫穷、疾病、死亡、洪水、干旱和火灾肆虐，父女反目、夫妻离散、情侣分别，侠士无忧的享乐也蒙上末日悲哀。男女间爱的燃与灭，骑士对荣誉的捍卫，朝圣者的义举等波澜迭起。光明与黑暗较量，效力于黑暗的是邪恶的辛特拉姆，致力于光明的，是为上帝千年王国的早日到来而努力的人们。最终，播撒仇恨和不幸的辛特拉姆在狱中死去。少校被自己豢养的熊咬伤而死。上帝的风暴平息，大地在众人的协同劳作下日趋和美。侠士派人接少校夫人回家，一路上，少校夫人看到长湖两岸的变化十分欣慰。回到埃克比，因肺炎而奄奄一息的她和侠士达成谅解。临终，少校夫人打算把埃克比赠给侠士，遭到尤斯塔·贝林拒绝，他不希望侠士因财富而懒散并自弃。侠士们都将离开埃克比，而尤斯塔·贝林打算成为乡间琴师和自给自足的农人。

小说中描述的湖泊山川都有原型，一座座庄园都能在作家的故乡找到对应物，一些人物也被认为出处有循，如尤斯塔·贝林接近于拉格洛夫的父亲谈起的一位熟人，发明家德国佬差不多是卡尔斯塔德一名出色的建筑师，一位着男装的有钱女人很有少校夫人的派头，等等。但拉格洛夫描述的不仅是写实主义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更是根植于自然、记忆、传说和想象而创造出的文学景观。她的抱负在于提炼，提炼一种精神，如小说中所言，“……我梦中的湖，在它的岸边，我看见过诸神漫步，而从湖心深处，我的魔法城堡升起”。“我”的“梦”，“我”的“看见”和“我”的“魔法”紧密相连，“我”的思绪和那往昔的“诸神”的精神息息相通。

听了故事的孩子，站在冬日的窗边，她看那天边不见云朵，却见侠士们在单马拉的车上，星星是点在伯爵府邸的蜡烛。“这孩子的脑中充满了这些旧时代的人。她爱他们，她为他们活着。”庄园

的传说，即便今日在瑞典乡间也在继续，且在生活中时有画龙点睛之效。人们乐于谈论庄园里生活过的人，那些逝去的人们的逸事，也因为讲述，那些人和事日益闪出异彩。地广人稀而老年化严重的乡村里，一座座只在夏天才有人居住而折射出往昔幻影的家园，在这样的谈论中透露着不灭的意志。谈论或为留住，就像拉格洛夫对那些传说的再创作是为留住。留住往昔的时代、人们、梦想和精神。她以精神和梦想为贵，那些人物和庄园的灵魂借助于文字可以走得更远。拉格洛夫于是在小说结尾欣慰地表示：“也许这会让您们满意，让您的名字和那热爱的邸宅一起再次回响？愿所有属于您的生命的辉煌重新落在您们生活过的这个地方！博宜还矗立着，比雍纳还矗立着，埃克比还在芦汶湖畔，被激流和湖泊、被园子和微笑的森林草地美好地环绕。站在宽大的阳台上，传奇就会围绕人们飞舞，像夏天的蜂。”

浪漫还是现实， 往昔还是现代？

这部作品问世后未引起轰动，毁誉参半。有人叹作者为天才，是在漫长而无趣的文学寒冬后，突然冒出的春意，突然响起的新诗人的啼唱，作品想象绝妙，充满动感和变化——这个作家有能力描绘世上的一切。有人则认为内容空洞，难以理解。大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在不否认作者才华的同时，也认为故事不可信。在致友人的信中，拉格洛夫写道，“现在，既然我已在那里，惊诧了世界，被书写于瑞典所有报纸纸端，忽而被看作天才，忽而被视为疯子，我觉得我可以自由呼吸了……他们现在总算知道我是谁……”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部作品，斯堪的纳维亚最重要的批评家，丹麦的乔治·布兰迪斯（George Brandes，1842—1927）一眼看出作家的才华，也建议她从此走出韦姆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

本来，拉格洛夫用正文第四章小标题“尤斯塔·贝林，那个诗人”作了书名。《伊顿》的编辑早在获奖启示中就对标题做了修改，启用“萨迦”一词，副题为“一个来自古老的韦姆兰的故事”。以为这么一署，对“萨迦”这一冰岛文学形式了然于心的瑞典人，从第一眼就能期待一些离奇的故事；而读者将是故事发生地韦姆兰省的人们。拉格洛夫后来表示，她认为这一改动是成功的。

把“萨迦”标签贴上这部小说确实并无不妥。从插着自制的翅膀在天上飞，到举起装银弹的枪瞄准天上的大熊座，进而准确射中一头大熊，作品中确实穿插了很多离奇事。瑞典的权威文学评论家奥斯卡·莱文汀（Oscar Levertin，1862—1906）诧异于书中的奇异想象，不无偏见地惊呼：拉格洛夫小姐，一位“小小的女教师”，从未离开瑞典地方，独自生活在一个被遗忘和掩藏的神秘里。她吸收了故乡盛行的神秘……本该在她的童话森林和传奇地域逗留。这一切得以让诗篇丰富而自然地流出，就像葡萄酒从葡萄中流出，奶汁从母亲的胸脯健康和温柔地流出。

正如莱文汀所言，韦姆兰是浪漫的土地，孕育了拉格洛夫笔下的浪漫人物，也孕育了曾活跃在故事发生的浪漫年代的，瑞典文学史上的诗歌大家和瑞典学院院士埃塞雅斯·泰格纳（Esaias Tegnér，1782—1846）以及埃瑞克·古斯塔夫·盖雅（Erik Gustaf Geijer，1783—1847）。和拉格洛夫同时期的天才诗人古斯塔夫·福楼丁（Gustaf Fröding，1860—1911）则与拉格洛夫有一面之缘，被她看作“一个水精灵碰巧跑到了人的生命里”。福楼丁说过：“拉格洛夫的韦姆兰是美妙地夸张、凝炼了的韦姆兰。”的确，在这部作品中，有湖泊、河流、高山、深谷、沉郁的森林和富裕的庄园，像一出交响曲，是施展了魔法的丰饶大地。它不是对童年记忆的机械复述，而是背负了自然和文化的集体记忆的个性和天才的创作。

对这部作品的争议的焦点是故事是否可信、合理。

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在 1879 年于瑞典风靡一时。犀利而沉着的现代主义笔触日益举足轻重。拉格洛夫的这则萨迦和当时的现实主义文风却有很大出入，对其可信度疑问的关键，不在于小说和萨迦的挂钩，而在于作家十分留恋的后浪漫主义及无法放弃的理想主义精神与那时的时代已有距离。但这些精神对于作家想用笔墨留住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英雄和女性来说，却是最重要的特质。那群人中唯一相对现实和现代的是玛瑞安：自我一度不完整，总有另一个“我”，冷眼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看成对活着的“表演”。然而，“我”十分仰慕过去那些有着燃烧的激情，能够奋不顾身的人们，并感叹，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人了。像无法丢开的旧梦，拉格洛夫把现实浸泡在传说和神话的琼浆里，那些未必真实的传说有了赖以复活的真实基础，现实则有了更宽大的、不只局促于眼下的飞翔之翅。无论书写的是传奇还是现实，都给人以神圣体验。而关于蜂入巢的譬喻出现在小说结尾，对想象和现实的关系做了个颇具先见之明的开放式回应：“想象的巨蜂已围绕我们转了年年月月，要想钻进现实的蜂巢里，可得看仔细了。”

仔细看去，在这部作品里，往昔和当下、传说和真实水乳交融。讲述往昔人物事件的同时，不时穿插“我”在“今日”和“此刻”的实景实情，让现实和历史对接，比如，“甚至今日，当我走过贝雅农庄，抱怨陡峭的坡和令人憋气的灰尘，我欣喜于看见小树林薄薄的白色枝干在对美好的年轻人爱的记忆中闪光。”更重要的是，作家把当前铁矿和农业的萧条，底层人民的暴动写到了过去的年月中，还融入引发着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如女性、婚姻、阶级、宗教等，表现的冲突是现代和现实的。比如，几个美丽女性提示了不同状况，安娜代表婚姻中的经济问题，玛瑞安揭示的是名誉，在年轻的伯爵夫人的婚姻中，显示了从作为妻子的家长和监护人的丈夫，到与妻子并肩行走，有友爱关系的丈夫的变化。爱上一

名男子于女子而言，可能意味着对家长制的反叛，而尤斯塔·贝林成了玛瑞安她们和父权的冲突爆发的催化剂。家长制体现在父女间，也在夫妻间，如玛瑞安的父母及年轻的伯爵夫妇，甚至当父母缺席时，牧师太太能在安娜身上代行父母之权威。不过，拉格洛夫赋予笔下的女性的，不只是觉醒或牺牲，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无论是那几个和他相爱过的女性，还是母亲一般的少校夫人，都帮助了尤斯塔·贝林走上成人之路。

拉格洛夫说是要描绘往昔人物的事迹给后代的孩子们，但在过去的事件中翻滚的也有当下时代的风云。于一定程度上，她把作品弄成了在“过去的萨迦”乔装下的“现实小说”。传说、想象和写实交织，现实和真实并未在这件庞大的想象艺术品中迷失，而成了叙述的前提和想象的基石。以为远走了的一切，在她笔下复活并发出异彩，不管她描绘的从表面看是什么，她攫取的是生活和人性的逻辑，在摩登或过时之外。不是纯粹的萨迦或小说；不单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难怪有人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是拉格洛夫的独门绝活，它不一定完美，但这一具有特殊形式和内容作品，甚至作家本人也不能复制。百年后并不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许也还要眺望拉格洛夫的背影，感叹先鞭更有早行人。就像萨迦是出版商贴给这部小说的标签，“萨迦”一词日后多少成了拉格洛夫的一个标签；而后来《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旅行到其他国家，不少国家的人们又给她贴上童话作家的标签。她远不只是童话作家，只不过，她的书写充满童话和传奇色彩，而神话的闪光和现实的锋芒交相辉映。

在欧洲的文学苍穹下

冰岛的萨迦不是这部文学经典的唯一源泉，甚至瑞典的贝尔曼和芬兰的鲁内贝里也不是。从这部小说里能看到了欧洲文学和艺术

对作家的多方面影响。拉格洛夫浸淫于欧洲文学传统，在庄园图书室里阅读了不少文学著作。早就有研究指出这部处女作和歌德的《浮士德》的联系。浮士德有着和魔鬼的交易自不必提，更重要的是浮士德的那句话，“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少校夫人和年轻的伯爵夫人等多位女性都是尤斯塔·贝林的救助者。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苏格兰作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著作《法国革命》的熏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等作品的启发；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的滋养；看到流浪汉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的微笑。另一个养料，自然是《圣经》。作为教师，拉格洛夫的授课科目之一便是圣经课，而一出生就被灌输了新教信仰的她，对《圣经》耳熟能详，行文时能把圣经典故和自己的故事无缝对接。她也熟悉希腊、罗马和北欧神话，于是诸神都在，成了埃克比的十二位侠士，在普通的衣着下也无法掩藏内在的神采。

另一方面，吸取了欧洲文学养分的这部小说也滋润了很多文学大家，比如后来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豪托马斯·曼曾饶有兴致地阅读这一则萨迦。拉格洛夫曾向当时已移居意大利的瑞典前辈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讨教写作经验，对方在1892年读到这部作品，十分激动，盛赞其中的诗意、力量与独特，鼓励拉格洛夫将处女作小说改编为戏剧。拉格洛夫也影响了大批后来的北欧作家，包括《走出非洲》的作家卡伦·布里克森，甚至今日的瑞典学院院士、作家夏斯汀·埃克曼等。埃克曼在自然中寻求永恒性，和拉格洛夫对浪漫和理想的眷恋如出一辙。

并不过时的讯息

韦姆兰这片妖娆土地上，几无一人生活顺畅。人们不得不在苦难命运的翻弄下经受角色的转换和生活的跌宕，变故会发生在瞬息

之间。熊、狼、天花、大水、干旱等是自然和生活中危险和不幸的象征。面对生的疾苦，众人以酒浇灌，我怎能独醒——这一度是牧师尤斯塔的说词。

和连绵的苦难对应的是瞬间的快乐。在故事开始的第一个圣诞夜，尤斯塔·贝林便赞美十二个侠士，好像十二个神，个个都有特别的神奇。他们将他们定性为让韦姆兰的喜悦保持生命力的一群，因为他们深知让心远离金子，让手远离工作。假如他们不存在，那么“舞蹈将死，夏天将死，玫瑰将死，纸牌将死，歌曲将死，这被祝福的土地会一无所有，除了铁和工厂主”。不求世俗的显达，活得无忧无虑的是侠士。他们有蝴蝶的本能，在夏天结束前就能预感死亡的来临。蝴蝶、玫瑰、纸牌、舞蹈、音乐和夏天都指代瞬时的享受。侠士们重视快乐和领悟，他们的姿态对应的是功利和琐屑的庸常。

但最终，那个在刻画着键盘的木头桌上陶醉地弹奏贝多芬的老人，那个因未婚妻淹死在河里而遭受过生活的致命一击的人，使尤斯塔·贝林意识到，生活的第一职责是勇气和快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男人得承受生活提供的一切，带着内心的勇气和唇边的笑容；生活是残酷的，自然是残酷的；可这两者都能生成勇气和快乐，作为对抗艰难的平衡物，否则，谁也不能承受生活。这样的快乐观和生活态度，让侠士们起先追求的瞬时享乐观获得了升华。

同时代的男评论家认为拉格洛夫保有了孩子的眼睛和心灵，也不免幼稚；还称她有脾气和原则的老小姐。然而，孩童似的眼眸和心灵比成人的更明澈、更富于创造力。唯其有了这样的眼和心，才可在萨迦的世界自由进出，直抵灵魂。这是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的切入点 and 层面。看得精准又充满最天然的情绪。

老小姐的原则和脾气大约和拉格洛夫体现的道德感有关。瑞典文学教授艾芭·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几年前提及，拉格洛夫的作

品似不如斯特林堡以及瑟德尔贝里的更称得上鲜活的经典。她把原因归为后两者主要写的是恶，前者写的是善，而在审美中，对恶的描写被认为处于更高层次。

虽说拉格洛夫和这两位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都常见于书店，但她的文本确实不如后两者的更能成为当下的话题。斯特林堡的《父亲》，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都还经常上演，但鲜活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写恶，更可能是因为，比如牵涉到“婚姻中男女力量的较量”“肉体的饥渴和灵魂的孤独”“他人即地狱”等在当今也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比之单单写恶，写出善恶间摇摆的更耐人寻味。对于《格拉斯医生》中的医生及其他登场人物，谁能断言究竟谁善谁恶，谁是谁非呢？

拉格洛夫的这部萨迦写到不少恶行，更劝恶扬善，表现出明确的善恶观，这也是拉格洛夫在作品中的常态。她相信，快乐和美好要历经艰难，人必须也能够肩负社会发展的责任，她怀抱谦卑的人类之爱，就像对千年王国的信念，她对人性之光明满怀信任。然而，不同时代对恶的定义不同，能传达善恶矛盾性的作品在善恶边缘日益模糊的当今或许有更高的被接受度。从这一点看，拉格洛夫的萨迦在道德层面表现得较单一。对美好的信念虽说和当下的时风渐行渐远，却和她热爱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紧紧相连。侠士的幸福观，无论起初那种不问金钱、但求快乐，还是后来的承担责任、怀抱辛苦，如今都远非主流。当今的读者或也会发出如书中的“我们”对讲故事的奶奶发出的惊叹：这些人怎会如此，竟不计后果，不为自己考虑吗？我们不会，我们都有“自我”冷眼旁观，理性会粉碎激情和理想。

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是否过时，人各有看法。抛开这些不谈，只要你愿意将浮尘吹开，就立刻能看到文本的璀璨。拉格洛夫有关人性、和平、正义的信息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一定永不过时。